

一段中华民族的屈辱史
一段令世人发指的日军暴行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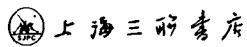
上海 日军慰安所实录

苏智良 陈丽菲 姚霏 著

(上)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 日军慰安所实录

苏智良 陈丽菲 姚霏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日军慰安所实录 / 苏智良, 陈丽菲, 姚 霖著.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5. 5
ISBN 7 - 5426 - 2079 - 7

I. 上… II. ①苏… ②陈… ③姚… III. 日军—侵华—史料—上海市 IV. K265. 3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30751 号

上海日军慰安所实录

著 者 / 苏智良 陈丽菲 姚 霖

责任编辑 / 王秦伟

装帧设计 / 范娇青

监 制 / 林信忠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www.sanlianc.com>

E-mail: sanlianc@online.sh.cn

印 刷 / 上海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978 1/16

字 数 / 137 千字

印 张 / 20

印 数 / 1—4000

ISBN 7 - 5426 - 2079 - 7/K · 104

定价: 28.00 元

著名学者

苏智良 教授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对 60 多年前侵华日军占领上海期间，掳掠中国及其他国家良家妇女充当“慰安妇”，并在上海各处遍设慰安所这一人间暴行进行了长达 13 年的研究和资料搜集，用大量的图片、人证和物证历史地再现了当年日军在占领上海期间所设立的近 150 处慰安所情况，进一步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违反人道主义，违反人类两性伦理，违反战争常规的、制度化了的国家犯罪行为。

上海市教委“十五”规划科研项目
上海市教委中国近现代史重点学科规划项目

上海日军慰安所解析

“慰安妇”，日语发音为“IAN FU”，英语译为“Comfort Women”。“慰安妇”是指被迫为日本军人提供性服务、充当性奴隶的妇女。“慰安妇”一词带有很大的欺骗性，因为“慰安妇”的实质是日军的性奴隶，而“慰安妇”一词是加害者一方的日本政府、日本军队、日军官兵所采用的语言。正因为如此，至今亚洲各国的很多受害者，仍坚决反对使用这一名词。

国际学术界公认，日本“慰安妇”制度发生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而这三个阶段恰恰可以以上海的日军慰安所之演进来表述。上海日军慰安所之典型，由此可见一窥。

一、日军慰安所的出现

上海是日军实行“慰安妇”制度的发源地。

自晚清始，上海就是日本海军在海外最大的基地。为了给数以千计的海军陆战队官兵提供“卫生”的性服务，早在1931年11月，日本驻上海海军当局已将虹口一带的“大一沙龙”、“小松亭”、“三好馆”、“永乐馆”等4个日本侨民经营的风俗场所，指定为海军特别慰安所，不仅要求其对日本军队开放，还要接受军医的身体检查。这是慰安所名称的第一次出现，也是世界上第一批慰安所。

我们对“大一沙龙”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调查，经过数年的努力，寻访到在其中工作的证人、日本老兵知情者、当年去装修慰安所的退休匠人等，“大一沙龙”的历史轮廓已基本调查清楚，且该处的5幢房屋至今保存完好。

二、日军慰安所的延续

在 20 世纪 30 年代以前, 所谓“慰问战地官兵”的女性, 并未见有称“慰安妇”的, 她们往往被称为“卖春女”、“酌妇”。“慰安妇”一词正式的使用, 约见于 1932 年日军进攻上海的“一·二八”事变以后。后来担任侵华日军最高司令官的冈村宁次, 此时任日本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正是他, 为了维持败坏的军纪, 首次要求日本国内组织关西地区的妇女, 集体来沪“慰问”日军, 他采用了一个好听的名词——“慰安妇团”。1932 年 3 月, “慰安妇团”登陆上海, 并在吴淞、大场、江湾等地为日本陆军服务, 这是日军第一次使用“慰安妇”一词。从此以后, “慰安妇”的身影开始遍及日军铁蹄践踏之处。当“一·二八”事变结束之后, 日军“慰安妇团”虽返回了国内, 但日侨、朝侨经营的为日军服务的慰安所却不断增加。

三、日军慰安所的扩展

1937 年日本全面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以后, 日军逐渐占领上海。战争初期, 日军设立了上海派遣军东兵站司令部管理的杨家宅慰安所。这是一个知名度非常高的日军慰安所。一方面, 它的许多制度如“慰安所规定”、价格等成为后来日军慰安所的范本; 另一方面, 也是因为军医麻生彻男拍摄的照片和相关记录, 留下了真实的史料。此后, 日军直营的, 日侨、朝鲜侨民经营以及汉奸经营的各种慰安所充斥于上海各处。

根据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 13 年来的调查, 日军在上海的慰安所, 散见于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有史料或证人证明的, 至少有 140 多个, 数量之多远远超出我最初的预期。因此, 可以说, 上海是日军“慰安妇”制度最完善、慰安所数量最多的城市。

在上海, 有些地区的慰安所是非常集中的。作为进入上海第一镇的吴淞, 曾驻扎大量日军。据多年调查, 前后至少有 17 家慰安所在那里出现; 日军第 13 军司令部设在江湾五角场(其址现

在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 其周边的慰安所十分密集; 江湾万安路战时被日军称为“花街”, 有慰安所 6 处; 四川北路周边曾是日本人居留活动的中心地带, 也是慰安所最密集的区域, 共计有 70 处以上, 包括美楣里一条弄堂的 14 个慰安所和松柏里一处的 8 个慰安所。

当然, 这 140 多个慰安所, 远不是日军上海慰安所的全部。举个例子来说, 冈村宁次带来的“慰安妇团”, 曾在上海战场活跃地为日本陆军“服务”, 其在吴淞、大场、江湾、纪家桥、庙行等战地的情况, 至今尚不清晰。闸北曾经也是慰安所的集中地, 1940 年, 为了管理慰安所, 还曾设立上海市虹口闸北区慰安组合会, 制定《管理慰安所临时规约》, 但遗憾的是调查中几乎没有收获。还有一些慰安所地点尚不明确, 也未统计列入。如当年担任过旗昌栈日军慰安所帮手的黄文忠, 生前回忆在横浜桥畔有个分所, 本来我们希望他能带调查者去寻访, 但这个调查因黄文忠的病故而中断。

家住日本久留米市的近藤老人, 学生和青年时代是在上海度



苏智良与近藤的合影

过的。根据他的证言，四川里弄口的 63 号，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日侨经营的酒吧，“一·二八”事变以后实际上是接待日军军官的慰安所，名为“六一亭”。“六一亭”入门后是个大房间，当时用来提供酒菜和咖啡，后面是厨房，旁边有螺旋形楼梯通向二三楼，当时只有店员和海军军官才能上楼。楼上为一长排房间，共有 30 余间，每间七八个平方。据近藤所言，这里的“慰安妇”清一色全部是日本女子。近藤作为第 13 军司令部的传令兵，曾去过杨家宅慰安所。我与他有个约定，在他生前，不公开他的证言，现在他已离开人世，我有责任将他的证词公布。

再举一例。陆某是昆山小教堂的牧师，于“八·一三”事变炮火平息后，来到上海，与日军有所交往。一日，一位日军军官邀请他参观设在虹口的“行乐所”。该所设在北四川路横浜桥附近，原是银行的营业所，其中竟关押着数百名中国性奴隶。对于这个“行乐所”，无论是日方还是中方，除此没有片言只字的记载，若不是陆某偶然入内探得秘密，作此历史的记录，那么，这个牺牲了千百名中国妇女的“行乐所”，便永远无人知晓了。⁽¹⁾

四、上海日军慰安所之类型

日军慰安所按其经营方式可以分为多种类型。第一种是日军自己经营的慰安所。如 1938 年 1 月设立的杨家宅慰安所，由日本上海派遣军东兵站司令部设立。日军占领上海初期，设立过一些抢抓中国女子为性奴隶的场所，在虹口地区设立的“行乐所”等也属于此类。“八·一三”事变以后，日军占领了杭州路、眉州路一带作为军营，最初驻扎的是千田部队。在现在的跃龙化工厂门口的位置，日军设立了千田部队慰安所。后来深谷部队入驻于此，于是，该处又换成了深谷部队慰安所。日军上层始终关心慰安所的设置，1942 年 9 月，在日本中国方面军总司令部举行的副官（庶务军官）会议上，明确要求增加上海慰安所数量，这份文件现在藏于

(1) 《上海的地狱——敌寇的行乐所》，《大公报》1938 年 2 月 27 日。

日本防卫研究所。

(前略)

九、上海地区的慰安设施比较少，应考虑增设。军队聘用人员也希望增设娱乐设施(如汽车厂、军火厂、货物厂)。

意见 上海地区现有慰安设施如下：

1. 特种慰安所 16 家，酌妇人数 140 名；
2. 休息娱乐所 军队专用休息所、料理店、食堂计 7 家。

(中略)

现在各类设施最近利用情况判断如下：

1. 特殊慰安所 有增加之必要；
2. 军队专用休息所、料理店、食堂等，因禁止利用地方上的设施，所以显得不足；
3. 演艺场所 有增加之必要；
4. 各种娱乐设备因利用者较少，故没有增加的必要。

十二、卫生避孕套交付慰安所经营者之问题。

现在军队平均给每个士兵每 2 个月交付 1 只卫生避孕套，这里依据以下之理由而交付给慰安所经营者。

1. 过去，慰安所使用的避孕套是从市场上购买的，把避孕套交给军人是免费的，最近，由于市场上难以购买到才非常困难；
2. 像上海地区，规定慰安所等设备，各业者必须向进入的军人交付避孕套，但实际上，交付避孕套的并不多；
3. 从以往的情况观察，虽要求交付军人避孕套，但军人使用的几乎没有，这样变成了浪费或是拿着避孕套到军队慰安所以外的场所去使用了；
4. 各人拿着慰安所给的避孕套而到非军队慰安所的场合去使用，恐怕会成为事故发生的诱因。

因此，目前一个月使用量只有 4300 只。这是由登第 7331 部队后勤部门慰安所股制订分配方案而向慰安所的

从业者发放的。^[1]

第二种是日本侨民根据日军命令设立的民营慰安所。号称日本海军在沪最大的慰安所——“海乃家”，就是日本退役海军士兵坂下熊藏开设的，地址在公平路公平里，他儿子的名字也叫华公平。慰安所的房屋、开办费用、所需物品等均得到日军的大力支持，甚至连“海乃家”三个字也是军队确定的。江湾万安路、四川北路等就是日侨管理的慰安所的集中地。包括对外以其他面目出现的慰安所，如岸本忠治经营的“风月庄”，地址在施高塔路（今上海市山阴路）花园里 17 号，对外的名义是“日式普通旅馆”，实际上也是日军慰安所。

第三种是朝鲜侨民在日军的指使下设立的慰安所。这些慰安所多以“酒吧”名义出现，尤其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颇成规模。

第四种是日军或日本人指使伪政权或胁迫中国的妓院主开设的。这类慰安所出现于 1938 年以后，有的叫慰安所，有的则称妓院。

为了管理慰安所，经过伪上海特别市政府警察局、上海特别市卫生局批准，虹口闸北的慰安所公会于 1940 年设立，该会制定规约，全文如下：

上海市虹口闸北区慰安组合会管理慰安所临时规约

本组合成立之目的：为鉴于区内市面繁盛，人口众多，对于慰安营业确有限制之必要时，设本会管理慰安所一切事宜，以期扑灭花柳，保持健康为本旨。兹定临时规约数条于后：

- (一) 本规约于虹口闸北区内适用之。
- (二) 组合长应受闸北警察署监督指挥办理一切事宜。
- (三) 本会设组合长一人，组合员五人，医师一人，看护一人或二人，其他员役数人。

[1] 吉见义明编：《从军慰安妇资料集》，大月书店 1992 年版，第 269—272 页。

(四) 凡在虹口闸北区内营业慰安所者，均须先行填具慰安所申请书三份，本人二寸半身照片四张，呈送本会审核后，转请闸北警察署发给许可执照，方准开业。

(五) 妓女每月须经本组指定医师检验三次，确无花柳病者始准营业。

(六) 慰安所内设备必须清洁卫生，置备消毒用品。

(七) 妓女不准在门外或路旁强行拉客。

(八) 未满十六岁女不得为妓女。

(九) 改业必须将所领之许可执照呈缴本会转呈闸北警察署核销。

(十) 违背本规约各条之一者，得酌量情形停止营业（十日以下）或令歇业，吊销执照。

(十一) 本会每月至少开会二次，讨论一切进行事项，遇有紧急事项得召开临时会议，议决施行。

(十二) 本规约如有未尽事宜得随时更正之。

(十三) 本规约自奉闸北警察署核准之日施行。

这个规约规定，开设慰安所者需提供申请书，由闸北区警察署发给许可执照。目前尚没有发现这类申请书实物。此后到1941年，以日本海军为后台的上海虹口平康福利会宣告成立，其目的是“为根除梅毒，保障日支军民健康起见”⁽¹⁾。日本同仁会华中支部长世井中将还担心“慰安所名称与军之慰安所名称混同，恐士兵误会不可用”，并指示：“娼妓大多为华人，原属市府本身职务，现因环境关系，先行利用福利会试办，得有头绪后，再由市府接办。”⁽²⁾

五、上海日军“慰安妇”的来源

从国别分析，“慰安妇”受害者主要是中国妇女。早在战争初

(1) 《上海虹口平康福利会通告》，上海市档案馆藏。

(2) 《伪上海特别市卫生局、警察局呈文》(1941年11月26日)，上海市档案馆藏。

期,迫不及待的日军便开始在战地大肆掳掠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随着战争的扩大和升级以及侵华日军的增加,日军更残暴地掳掠中国女子充当“慰安妇”。在中国战场,日军主要通过以下手段来进行“慰安妇”的征集。

第一种是通过暴力强行掳掠中国妇女。日军在上海掳掠中国女子后,当众“剥掉衣裳,在肩上刺了号码。一面让我们的女同胞羞耻,不能逃跑,一面又充当他们的兽欲的工具”。⁽¹⁾这种强暴、强征并不鲜见。《新华日报》曾刊文指出“八·一三”战役最后时刻日军对妇女的暴行。“上海四方协会原在闵行镇设有伤兵医院一所,自我军退出苏州河阵线后,即已改为难民收容所,其中住有良家妇女五百余名,系由敌宪兵驻所保护。迨至(1938年)一月二十八日,忽有大批敌兵开到该镇,将该所妇女一一奸污,敌宪兵目睹暴行,无可奈何”。⁽²⁾

在上海市档案馆也存有一些日本占领者强征中国妇女为“慰安妇”的记录。

1938年1月25日,公共租界巡捕房的副巡官万代尔发现日本人将集中于福州路的女子送往他乡,随即干预。请看他的报告:

本月24日中午12时,接到索尔特副巡官的电话,报称:当他负责由华捕1707号和2172号组成的旅馆搜查小组前往福州路604弄5号中华旅馆进行搜查时,发现在4号房间集合了几名女子(妓女),等待日本军方把她们从这儿带走。

索尔特将此报告了本人,本人将此事转报给主管警官正巡官谢尔斯韦尔,同时本人通知了中央捕房,请求派日籍警官,165号日籍巡长山本和207号日捕中山参加此行动。

下午12时20分,在上述警官及47号华籍探目陪同下,本人前往该旅馆,并从索尔特副巡官处得知下述情报:

(1) 宋美龄:《抗战建国与妇女问题》,重庆《中央日报》1939年1月15日。

(2) 《敌淫污闵行妇女五百名》,《新华日报》1938年2月1日。

上午 11 时 55 分，他来到这家旅馆逐个房间进行搜寻，在底层 4 号房间内遇到 9 名中国女子和 2 名中国男子。在审问时，她们说，她们是一名日本人要她们来此集合后去乡下做妓女的，在他询问这些人时，一名日本平民出现，他自称是日本军方的代表，于是副巡官索尔特给捕房打了电话。

下面是日籍巡长山本获得的情报：

上述日本平民名叫神田，他是一个名叫河西的日本占领区特务的代表。河西让他租下该 4 号房间，他们打算在那里收集 30 名中国妓女，这些妓女在日本军事医院通过体检后，就要被送往靖江。这位代表说，他认为，挑选工作到本月 24 日下午 6 时即告结束，并可望到时有一辆军车把她们送走，但他担心，如果没有军车，他就得让挑出来的那几个女子在旅馆里呆上大约 2 天（若情况允许的话）。该代表被告知，本人要将此事向主管警官报告，并通过日籍巡长山本把此决定通知他。

主管警官于下午 2 时 15 分，将此事通知“甲”区区长罗伯逊先生。只要选出的女子愿意让日本人带走，罗伯逊先生就批准这种做法。本报告随之将此批示转给日籍巡长山本。

下午 6 时，本报告人在 1013 号华籍探长陪同下，转回该旅馆，发现在那儿的 9 名女子和 2 名男子已于下午 2 时许被带走。事情经过大致是：警方人员一离开，该代表就出旅馆去打电话（那个旅馆没有电话），几分钟后折回。约午后 2 时，9 名女子和 2 名男子在该代表的护送下不知用什么方法给带走了。

本报告人询问了在附近值勤的巡捕，他们说，他们没有看见什么日本军车来，也没有看见这些人乘什么车离去的，显然他们是悄悄溜走的。

本报告人看到的那 9 名女子层次很低，当问她们时，她们都情愿跟日本人走，并不反对在离去之前留在旅馆里，这些女子是当我们到旅馆时在那个房间发现的 2 名

男子的指使下在那集合的，这两名男子和日本人一起离去，他们叫陈佐才和徐润洪。

本报告人查对了旅馆登记簿，查明这房间是由一个名叫沈国华的人租定的，1938年1月14日—28日这个房间都由他占用。特务的代表到24日上午9时才来，从9时到中午12时这些妓女陆续来到。

特此报告。

报告人：副巡官万代尔（签字）^[1]

2月7日，巡官又发现日本兵在天津路423号大上海旅馆集中被抢来的女子，人数达20人。可见，这类事件在日本占领时期尤其是初期还是比较普遍的。

更有甚者，不少上海女子被日军掳掠到外地去。2001年8月11日，我在黑龙江当地两位热心调查的韩茂才和宋吉庆陪同下，来到东宁县绥阳镇河南五委三组57号陈桂英家，听她诉说辛酸的往事。

陈桂英的家在闸北，具体路名已经忘记，她的亲弟弟现在还住在闸北彭浦新村。那年她18岁，有人来召佣工。陈桂英为了减轻家中的负担，便跟着那人走了。这样就到了哈尔滨，被押送到东宁——日军对苏作战的前线，成为了日军性奴隶。尽管这段历史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但老人至今还记得慰安所叫“乔燕堂”。一个18岁的女子，从繁华的上海被骗到北国的乡下，生活的轨迹完全改变。当我最后询问大娘，你还有什么话时，陈大娘只是留着泪说：“我也不会说话。反正那时真是很苦的，一个人最好的时光就这样被消耗掉了。我的命苦啊！”现在这位陈桂英大娘也已离开了我们。

(1) 上海市档案局编：《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罪行史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陈桂英老人在讲述往事(苏智良 2001 年 8 月 11 日拍摄)

根据《支那在留邦人人名录》第 33 版(1942 年出版)记载, 1942 年, 在宣城县湾沚镇有一个名为“上海美人馆”的慰安所, 经营者是来自日本高知县的狄野勇, 地址为第八甲街。从慰安所的名字可以看出, 其中的受害者来自上海。

第二种是设下种种圈套, 诱逼妇女坠入陷阱。1938 年, 日军占领上海后, 租界成了“孤岛”, 他们便在租界诓骗妇女。“他们放出野鸡汽车, 候在娱乐场所前面。等顾客上车后, 汽车飞也似的驰着, 到了僻静地方, 将男子抛下或干了, 女客便从此无影无踪”。⁽¹⁾有时则鼓吹说其任务是给日军官兵洗衣服、照顾伤员、打扫营房卫生, 诱使妇女参加。实际上是强迫良家妇女供日军官兵发泄性欲, 任其蹂躏。这种“战地后勤服务队”的人员, 绝大部分是即地强征。时人留下了一个《阿珠的遭遇》的悲惨故事。

阿珠, 是一个女子中学里的毕业生, 她今年才十九岁。她的家, 本来在闸北, 因为无情的炮火, 使她及她的父母从家里奔出来, 方才避居到租界里来。接着, 因为一个大工

(1) 《孤岛近讯》, 载《妇女生活》第 5 卷第 12 期, 1938 年。

厂的倒闭，她的父亲又宣告了失业，一家的生活，渐渐地陷入了恐慌的境况。她的父母只生这一个阿珠，所以，阿珠自身也感觉应该去担负一个非常沉重的责任，在家庭里极不愿意依“妇女回到厨房去”的一句话，老是躲在家里。她愿意到社会上去找件事做，挣一些钱来，奉养她的父母，因此在她发现这条广告的时候，她认为这是她一家三口的生活源泉。

广告上这样告诉她，某公司为扩充业务起见，拟添聘女职员数位，凡年在十六岁以上，二十五岁以下，略识文字者，均可应征，倘能粗通国语或日语者更佳，月薪五十元，有意者请至某处面洽。

她征得了父母的同意，立刻依着地址，赶到那里应征。详细地问了她的姓名、年龄、籍贯及学籍后，并没有经过什么考试，他对她微微地一笑。这一笑，很快地在他脸上消失，他还是挂着一副严肃的面孔，对她说：

“很好，你的资格很适合，但是这里是临时办事处，你还得坐上我们的汽车，由我们这里派一个职员，伴着你到我们的公司去，见见我们的总经理，面试一下。”

这好像是投考的应有步骤，而且在白天，她并不害怕什么，所以她毫不迟疑地随着他们所派的一个职员，踏上汽车。呜呜的几声喇叭响，这辆汽车便飞一般地驶向东面而去。

车身拐了好几个弯，并且经过一顶广大的桥面，在一座大厦的门首，停止了行驶。她下了车，发觉这里是上海东区，是“八·一三”炮火发生地不远的地方。她想到这里，就好像四周有非常紧密的机关枪呼叫。一颗巨大的炮弹，从她头顶上掠过，她吓得几乎哭出来，她很明白自身已经陷入魔窟。恐怖，笼罩了她整个的心灵，她的四肢是这样战栗，她好像丧失了聪明，她不知道哪一条是她可以逃走的路。

一只强有力臂膀，不容她站在那里呆想，一把扭住她的